

中國文哲論集⑤

中國現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民族
國家論述

主編 / 本處編委會
執行編輯 / 胡曉真

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中國文哲論集⑥

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民族國家論述

—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

主 編

本處編委會

執行編輯

胡 曉 真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印行

1995年6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論集⑤

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民族國家論述——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

主 編 本 處 編 委 會

執行編輯 胡 曉 貞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 話：(02)7883620

印 刷 者 木 川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昌吉街 110 巷 37 號
電 話：(02)5921949

定 價 精裝本 新臺幣 350 元
平裝本 新臺幣 260 元

中華民國 84 年 6 月初版

ISBN 957-671-309-9(精裝)

ISBN 957-671-310-2(平裝)

出版說明

本處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八月，次年正式聘請研究人員，推展研究工作。初期的研究方向有五：一、古典文學方面：著重於古典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理論等之研究。二、近代文學方面：著重於清代中葉以後之白話文學、民間文學、中外文學關係與近現當代文學相關問題之研究。三、經學方面：著重於經學文獻、經學史及經學與文學、哲學關係之研究。四、中國哲學方面：著重於先秦諸子、中國歷代重要哲學思想及哲學與文學關係之研究。五、比較哲學方面：著重於中外哲學思想之比較及近代哲學相關問題之研究。

為推展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本處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假本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發表精闢論文多篇，會後彙集整理為《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並題為「民族國家論述——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臺灣文學」，以廣流傳，並收切磋琢磨之效。

本處副研究員彭小妍女士為本論文集編委會召集人，在編輯工作的推動上出力甚多。實際編務由胡曉真女士負責，編輯過程中並承劉苑如女士多次鼎力相助。其餘同仁協助校對者有周大興、曾純純、陳明恩、黃安州、鄭秀卿等諸先生女士。並誌於此，以表謝忱。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謹誌

一九九五年六月

目次

出版說明	(1)
目次	(3)
導言	彭小妍 1
、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主題演講）	李歐梵 9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	王德威 25
梁啟超與《新小說》	林明德 67
以看一幅畫的方式來讀《孽海花》——晚清文學中的傳統 藝術手法與新小說的結合	葉凱蒂 85
✓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類型特徵	陳平原 117
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彭小妍 137
邊緣的抵抗——試論魯迅的現代性與否定性	楊澤 173
鉛筆的戀愛，汽車的共和國——胡適的留美經驗與《終身 大事》	藤井省三 207
海、母愛與自戀——關於冰心的「前俄狄浦斯階段」	黎活仁 217
吳組綢的風格與結構	Oldřich Král(克拉兒) 229
論《虹》——試探茅盾作品的「非寫實」因素	是永駿 239
哈哈鏡中的映象——三十年代中國話劇的擬寫實與不寫實： 以曹禺的《日出》為例	馬森 263
談「自由文藝論辯」	尉天聰 283
絕對大眾原則與現代文學諸流派的困境	劉再復 295
于無聲處聽驚雷——析論臺灣小說第一篇〈可怕的沈默〉	陳萬益 319
不為人知的龍瑛宗——以女性角色的堅持和反抗	林瑞明 337
楊守愚小說的風貌及其相關問題	許俊雅 359
附錄一：著譯者簡介	389
附錄二：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議程表	395

導 言

八〇年代中期以來五四文學研究在台灣逐漸嶄露頭角，1987 年解嚴後，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大放異彩，儼然成為顯學。探究兩岸新文學源頭，晚清以降生氣蓬勃的新小說風潮可謂發其端緒。1993 年 12 月中國文哲所首度舉辦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副標題訂為「寫實之外」，發表的論文涵蓋晚清、五四和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研究，一則是正視現代文學研究上寫實批評的傳統，一則是企圖另闢蹊徑，開創研究的格局。現代文學的發展由晚清過渡到五四，是絕然的斷裂，還是有延續的軌迹可循？現代文學「感時憂國」的主題已是耳熟能詳，評家如何重新詮釋？台灣新文學發端時，在殖民政府統治之下，文人的「感時憂國」有何不同表現方式或不同面貌？

李歐梵教授的專題演講〈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探討晚清由西方移植來的啓蒙思想，如何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產生迥異於西方的效應，其間的互動又如何刺激晚清以降新文學所表現的現代性。啓蒙精神與理性、進步的歷史觀，配合晚清報業所開創的「公共空間」，形成文人對新中國的「文化想像」。李指出從梁啓超以來，晚清和五四小說所扮演的任務是「建構、想像新的民族國家」。但同時又有一股「己」的暗流興起，從章太炎到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蔚然形成與主流對話的思潮。

「建構、想像新的民族國家」的主流思潮，表現於文學中的是「寫實主義」。李轉述鄭樹森的說法：1923 年瞿秋白把馬克斯介紹進來中國時，把「寫實」改為「現實」，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因為如果「寫實是技巧的話，現實就是一種真理，也就是從當時的一種批判現實的精神，加上一種歷史的意義……如果說新的歷史潮流是往前走的話，走向烏托邦的話，那麼所謂三十年代的略帶『左翼』味道的現實主義小說，基本上是印證了歷史宏觀、歷史的大敘述模式。」長篇小說

例如茅盾的三部曲和巴金的《家》，就反映了這樣的歷史任務。

相對於擁抱「啓蒙」任務和歷史任務的寫實小說，二、三〇年代出現了一批作家，追求時髦、都市文化的刺激，許多機關刊物都以「現代」爲名。例如施蟄存編的《現代》雜誌，葉靈鳳編的《現代小說》等。此時劉呐鷗從日本把新感覺派帶進來，此派文人如劉呐鷗、施蟄存、穆時英等的作品，對都市文化、男女愛慾各有詮釋，像施蟄存的作品表現的是超越寫實的怪誕世界。「到底上海都市文化的現代性是個什麼樣的東西？」這是李歐梵下一本書計劃探討的問題。如同李所言，三〇年代的京派、海派之爭，主要牽涉的是「人生觀」的歧異。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五四時期人生觀的論爭不僅涵蓋對民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對東、西方文化的反省，也涵蓋兩性關係和「羣」、「己」互動關係的檢討。這些議題與五四文學文化中呈現的「現代性」有何關連？尚待進一步研究。

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爲晚清小說的現代性重新定位。他指出晚清小說「既啓蒙又頹墮」；「既革命又退化」；「既理性又濫情」；「既諷世又玩世」。這幾句話道盡晚清小說難以界定的「現代性」特質。王指出他所謂的「被壓抑的現代性」（repressed modernities）有三層意義：「由即將失去活力的中國文學傳統之內所產生的一種旺盛的創造力」；作家積極熱絡的「現代」論述和下意識流露於作品中的「反現代」表現；上世紀末以來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文類，如科幻小說、狹邪小說、黑幕小說、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俠義小說等，雖「不以現代爲職志」，卻是學者描摹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時，不能忽略的一脈傳統。

林明德一直著力研究現代文學與傳播媒體的關係，重點是梁啓超如何運用晚清蓬勃的報業與雜誌業，推動散文界、詩界、小說界、戲劇界的革命。〈梁啓超與《新小說》〉一文指出梁氏創辦的《新小說》雜誌（1902-06）開風氣之先，討論「小說的特質、美學、範疇，與功能」，「爲小說、戲劇取得合法的身分證，並締造一個小說繁榮的時代。」林指出，《新民叢報》（1902-07）創刊時，梁氏發表〈新民說〉

揭示創刊宗旨：「國也者，積民而成，……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仔細檢視這段話，不但顯示出「建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的體認，也已經明白昭示：欲新一國，不得不新一國之民。林指出，在《新小說》的發刊辭中，梁氏更強調：「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林明德一文的貢獻，在於樹立檢閱晚清報業的模式。他統計《新小說》共二十四號，陸續出現過二十四種門類（即專欄），包括圖畫、論說、歷史小說、政治小說、哲理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寫情小說、劄記小說、傳奇、廣東戲本、粵東班本等。當然，讀者由門類名稱就可以判斷，《新小說》中門類的區分有相當程度的重疊現象。文學的門類界定區分本來是很複雜的一門學問。林明德的文章點出了研究晚清報業的一個方向。

由葉凱蒂的〈以看一幅畫的方式來讀《孽海花》〉、陳平原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類型特徵〉和彭小妍的〈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可以一窺晚清「革命小說」（或政治理想小說）、「寫情小說」（或言情小說）到五四「戀愛加革命」小說的沿革。如果我們同意葉凱蒂所說，《孽海花》的宗旨是「喚醒大眾，為理想中的新社會的到來而努力」，那麼名妓賽金花作為小說的女主角，以性能力周旋於眾男間、平步青雲，竟得參與中國的外交軍國大事，正暴露（或「烘托」）出中國官場和上流社會中「虛偽的道德觀」及腐敗。但她卻是一個可愛的反面人物，（也許像左拉的《娜娜》？）她在性方面的「獨立與自由」似乎使她與書中「自由女神」的意象相輝映，使她「浪漫的轉化為一位自由女性的代表、自由女神家族中的一個成員。」賽金花的性革命和中國的政治革命似乎有難分難解的微妙關連？

陳平原指出，晚清政治小說與言情小說的結合，正是五四「革命加戀愛」小說的源頭。但「新小說家尚無駕馭這一類型嫁接的能力，故政治小說的引入，徒然造成對言情傳統的壓抑。但如果從發展前景看，才子佳人之『走出後花園』，是言情小說自我調整以適應現代讀者口味並保持類型活力的關鍵一步。」由於小說被賦予「羣治」或「建構新的民族國家」的重任，小說家不得不把兒女私情和「家國興亡」

拉上關係。《玉梨魂》的作者徐枕亞安排女主角何夢霞死於武昌城下，「就因為『殉情』不如『殉國』」。事實上，整體來說，這類小說中戀愛勉強加上革命的模式，一直延續到五四。

無論這類型小說藝術成就如何，五四時成為主流之一，毋庸置疑。五四的戀愛革命小說，傳遞的訊息是：欲達到個人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幸福，革命建立新社會是必經之途。彭小妍的〈張資平的戀愛小說〉指出張資平雖一向居於「通俗作家」或「頹廢」派之林，但他專事描寫的三角、多角戀愛故事，卻流露出五四一代對烏托邦社會的嚮往。如果說晚清的言情小說「言情」而能「絕慾」，張資平的作品則強調情慾的描寫，正顯示出五四對「性事」的關注。事實上他著力最多的是「慾念」，而非性行為本身。他的小說反覆探討兩性議題，例如貞操觀對男女的適用、女性付出的育兒成本（或代價）、女性獨立與經濟獨立的關連、社會對婚外男女情慾的壓抑、婚姻制的武斷、情人制〔為性博士張競生所主張〕是否可行等等，在在反映出二、三〇年普遍體認到必須全面檢討、調整兩性關係。他作品中的亂倫主題是對傳統禮教規範的正面挑戰，而在情慾之海中浮沈的男女主角深受不倫之戀的苦楚，於是嚮往「到異域去」，異域成為他們追求情慾自主的烏托邦（或代表「死亡本能」的他鄉）。他故事中革命主題的模式如下：勞工階級愛上女主人；憎恨壓榨勞工和女性的男主人；參加革命以改造社會或宣誓打倒舊社會。就藝術技巧而言，張資本小說中的戀愛和革命的銜接確實「勉強」，卻提供了研究五四心態史的材料。

楊澤的〈邊緣的抵抗〉探究魯迅的「現代性」與「否定性」，他指出「在西方強勢文明的壓力底下，為了尋求在第三世界移植、建立一個現代的典範，魯迅卻走上了一條充滿否定與自我否定的路」。魯迅在日本學醫，課堂上播放幻燈片時看見中國人被日軍捆綁，即將斬首示衆的畫面，深受刺激。他認為醫學只能救助身體的疾病，卻不能改變中國人的精神，因此決定棄醫從文，由文藝來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楊澤根據孫隆基的研究，指出1902年開始，梁啟超的《新民叢

報》就陸續介紹法國的「國民心理學」理論，展開一系列有關中國國民性的檢討。而魯迅的阿Q是中國人的（或魯迅自己的）「否定的鏡象」。楊澤認為「魯迅的現代性是一種第三世界國家特有的『他人的現代性』：爲了振起『國魂』，喚醒中國人使其不淪爲『他人』的狀態，隱藏在魯迅作品背後的卻是他憂狂成疾、充滿焦慮與緊張的『憂國』的身體。」

來自日本、香港、歐洲的學者以迥異於中國學者的觀點，詮釋五四的個別作家和作品。藤井省三的〈鉛筆的戀愛，汽車的共和國〉談胡適的留美經驗與他的喜劇劇本《終身大事》。他認為在此劇中，自由戀愛的宣告方式反映出「新興智識階級的意識形態」：「一封用鉛筆寫下的情書對傳統社會提出自由戀愛的新理論，而且一對戀人坐汽車離家出走。」藤井對五四文人心目中的「新的民族國家」別有詮釋。他認為劇中一對戀人攜手「前往未來的中國」時，「不是根據五四時期中國的現實，是根據美國的個人主義原理建立的共和國」。如李歐梵所言，五四的「文化想像」涵括「建構民族國家」與「己」——個人主義——的概念；而兩者間的交互滲透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領域。

香港的黎活仁以〈海、母愛與自戀〉探討冰心的「前俄狄浦斯階段」（Pre-Oedipal）。他認為冰心的代表作品雖一向被認為是兒童文學或爲年青讀者而寫，事實上卻隱含「出生受傷」和「回歸母體」的思緒，並「頗有著『死亡本能』的求死的意志」。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五四有許多作家都流露出對死亡、暴力的執迷，例如沈從文、茅盾、廬隱、白薇等。五四文人一方面嚮往新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展現出積極的烏托邦精神，一方面又難逃「頹廢」的情緒。這一點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思考。

在民族國家論述的前提之下，許多邊緣性作家和文類受誤解或排斥。捷克的克拉兒首先說明詮釋是「了解的企圖」，是「溝通的行爲」，也是批評者的自我、成見和「他者」作品、及其他詮釋者的對話。他探討〈吳組綰的風格與結構〉，認為吳是典型的中國現代作家之一，雖然似乎與其他作家「相同」（傾向左翼或右傾論調），卻擁有

「他者性」(otherness)。在解析他的作品(或任何其他人的作品)時,不應受制於現有的批評框架。克拉兒認為吳組緇的風格結構類似「中國水墨畫裡的移動透視法的手法,甚至還有單色的畫法。一切都以低調處理,一切都以側影、手勢、節奏的方法來表達。」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許多主流外的「邊緣」作家,主流作家也曾寫作屬於「邊緣性」的非寫實文類,但目前現代文學史仍未就此全面檢討,有待研究者以新的批評角度發掘。

如前所述,五四文人高倡「寫實文學」,但在文學實踐上表現的是針砭「現實」,目的是建構新的民族國家。因此當時所謂「寫實」,與西方寫實文學傳統大相逕庭。是永駿的〈論《虹》〉探討茅盾作品中的「非寫實」因素。他指出《虹》的素材是茅盾情人秦德君提供的,其中包含她自己和胡蘭畦的身世經歷。他指出「作品真正的寫實性乃在於作家的實存(存在本身)裡」。馬森的〈哈哈鏡中的映象〉以曹禺的《日出》為例,探討五四話劇的「擬寫實與不寫實」。他「根據當日曹禺寫作此劇時的資料以及劇作『文本』所表現出來的效果,認為《日出》不是一部寫實的作品,反倒有喜劇的性質。」

晚清梁啟超的「新民說」奠定了民族國家論述的基礎。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之際,另一波民族文學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自由派文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與左聯辯論,胡秋原認為文藝是自由的,「如果以一種中心意識獨裁文壇,結果只有奴才奉令執筆而已。」這種言論引起左聯的反感。尉天驄的〈談「自由文藝論辯」〉討論1932年發生的「第三種人文學」論戰。他指出當時右派、左派均屬少數,「真正的大多數是第三種人」。他認為「那場論爭其實只是一場在左、右兩派政治鬥爭下自由主義作家之掙扎和奮鬥。」晚清以降的國家民族論述,到五四有何變遷,在各流派文人間造成何種衝激?劉再復的〈絕對大眾原則與現代文學諸流派的困境〉指出:「五四出現的現實主義小說,是帶有中國的啓蒙農民、改造農民的現代性特點的,這種『現代性』不是西方那種批判資產階級工業文明的『現代性』,而是批判過時的農業文明(通常稱作封建傳統)和這種古老文

明所形成的帶有穩固特點的國民性的『現代性』。」劉的論點顯然是針對左翼作品。左翼文學的興盛，使得五四文學的「現代性」雖延續晚清的「啓蒙」精神，卻以農民爲必須改造的羣體，發展出迥異於晚清的風貌。

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是一個方興未艾的新領域。在殖民統治之下，作家對民族國家之建構的關懷重點何在，又以何方式表達其文化想像？陳萬益的〈于無聲處聽驚雷〉發現 1922 年 4 月 6 日發表於《台灣文化叢書》第一號署名「鷗」的〈可怕的沈默〉一文，應是「已知文獻中的『台灣小說第一篇』」。他指出「留學東京的作者，以新正時期的街頭即景（拖車老馬被車夫鞭打，默默忍受）爲喻，影射台灣任由日本殖民踐踏的悲哀，並借由兩位台灣人的對話，討論台灣人被統治的兩種心態，作者委婉地諷刺隱忍與沈默者之不是。」陳萬益提供〈可怕的沈默〉原文作爲他的論文「附錄」，故事中兩個角色討論的重要議題是種族的差異和國民性的問題。台灣人、日本人、東洋人、西洋人，是否應該有差別待遇？白種人、有色人種，有色人種中又分漢民族、大和民族，這是「地理上、歷史上，自然必到的結果」？「台灣人第一也是應該要先打算台灣的問題」，還是「這是個人類全體的問題」？文中涉及進化論、生滅競爭的討論，可見作者對日本和中國的種族論述、國民性論述並不陌生。中國這類論述因列強欺凌而產生，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因承受受殖民統治的不平等待遇也思考這類論述，實有以也。

〈可怕的沈默〉以寓言式、辯論方式討論種族差別待遇的問題，委婉地參與國家民族論述。相對地，龍瑛宗則以女性的陰柔表現他對問題的關懷。林瑞明的〈不爲人知的龍瑛宗〉指出龍瑛宗雖曾參加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會中曾有「感謝皇軍」等言論，但 1960 年代後，學者普遍認爲「龍瑛宗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意識，代表著『屈從與傾斜』」。林透過其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研究，認爲「龍瑛宗在高壓統治時代，以女性角色作爲苦悶台灣的象徵」。

許俊雅的〈楊守愚小說的風貌及其相關問題〉討論議題之一是中國

白話文與台灣話文在楊守愚作品中使用的情形。她指出這兩種文學語言在其作品中出現「在 1931 年台灣話文興起之前即屢見，然則楊氏 1931 年之後的作品以閩南語創作基調的情形，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之多，這或者透露了楊氏使用台灣話文創作的困境。……當時小說尚處於使用方言詞彙的搖籃期，頗多用法皆作者隨意創撰，並未約定俗成，每位作者都有一些慣用的擬音漢字、閩南詞彙，而這些慣用語亦成考訂作者的旁證。」她根據楊慣用的「漸時」、「一壁兒」等詞彙，因此認為署名『瘦鶴』所作之〈出走前的一夜〉、〈沒有兒子的爸爸〉是楊所作。

在民族國家認同論述中，除了種族論述以外，語言認同是首要議題之一。台灣新文學發端之時，類似議題涵蓋：文學語文究竟應使用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語文，漢文學、中國文學、台灣文學的定義界分等等。這類議題在台灣文學史上週而復始，與政治認同議題息息相關，形成本土民族國家論述的特色，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彭小妍 謹誌

一九九五年六月

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 歐 梵

提 要

本文擬就「現代性」(modernity)問題展示其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影響。此一觀念，來自西方啓蒙運動的論述。自晚清開始，中國知識份子經由報章雜誌的媒介，為中國的現代性作出一系列的「文化想像」。五四運動的思想背景，也是以現代啓蒙思想為主，但在新文學創作——包括小說和詩歌——上，其發展方向與西方文學上的所謂「現代主義」仍大相逕庭，並不像歐洲的一些藝術家和文學家在藝術上對於現代性不滿。而中國現代小說仍以寫實為主，在時間的敘述模式上仍遵循現代性的前進觀念。雖然在卅年代有些「超現實」的試驗，但仍不能構成主潮。本文僅勾出一個歷史的輪廓，有待進一步研究。

2 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 歐 梵 主 講

劉 苑 如 整 理

此次很榮幸受邀回到台北，參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舉辦的「現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現代文學這個研究範疇，第一次搬上中研院的國際會議舞台，誠深具意義，我的積極參與，謹代表一種象徵的支持！這篇演講雖是即興不夠完整的，但或許可藉著我的粗淺思考，以期拋磚引玉。我為什麼要訂這個題目？因為大會所討論的，基本上是和我目前所研究的一個東西比較接近。我和大陸的學者汪暉正在這一年裡，曾經對於所謂的「現代性」這個題目，特別是引用到中國的歷史和文學裡，產生的一些影響及其複雜性的情況等，持續進行研究。所以我就把我們研究的一些想法提出來，而這些想法尚未成熟，許多論證的資料也未帶來，所以只有以後再來補充。

關於「現代性」，英文叫「modernity」。這個問題誠如大家所知，是糾纏不清、說不清楚的。「modernity」在國外，特別是美國學院，不管是研究人文或社會科學的，又都重新把它提起來，特別是有些後現代的學者，對於「現代性」提出重要的批判，認為「現代性」基本上為西方文明帶來非常不良的後果，特別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甚至於民族國家的模式，還有最重要的是他們批評的是所謂「rationality」，也就是理性的問題。對於整個的西方啓蒙主義的傳統，當然是從法國來的，而法國人也批評的最厲害，福寇就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叫做〈啓蒙主義是什麼東西？〉我個人覺得這種批評，不完全能夠接受，也不能完全推翻，因為我覺得啓蒙主義這個問題的幾個重要觀點，事實上在五四時期像陳獨秀、胡適等人基本上是接受

的，當然它移植到中國這不同文化的土壤中已經產生了不同的效果，我想把這個問題從中國的立場提出，把它放在中國晚清到五四時期的時空範疇裡來做一些探討。

那麼，到底「現代性」是什麼呢？我覺得除了上面說的幾點外，從中國晚清思想史的角度，我自己有一個看法，曾經在一篇英文論文提到過，就是晚清梁啟超、嚴復和那些受了他們影響的知識份子，對於整個時間觀念的改變。這個時間觀念改變，影響了整個中國現代史觀念的改變。換言之，他們認為時間是向前進步的、有意義的，是從過去、經過現在而走向未來的時間的觀念。這個觀念當然與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念有相當大的歧異，它是從一種新和舊之爭，逐漸走向時間前進的觀念，這當然受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我在論文中提到嚴復和梁啟超的文章，他們基本上認為整個歷史觀有這樣的改變，我在這因為沒帶論文資料來，因此不能一一舉證。而這個時間觀念的改變，直接影響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社會、革命，甚至到文學，我就想從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種時間觀念在晚清所表現的新型態是什麼？大家都知道，如果把這種思想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戊戌政變之後，整個在朝在野的知識份子，都提出一些維新的觀念，而這些維新觀念表面上看，是一種以前的新舊之爭，而它裡面已經含有一些非常新的內容了。這些內容包括一些基本的觀念的提出，而這些基本的觀念所用的辭彙大部分都是當時知識份子造出來的，像是梁啟超所說的「羣」，另外包括「社會」、甚至「國家」這些字眼，還有所謂的「文明」、「自由」、「哲學」等，這些字眼大部分都是由日文翻譯，再轉譯為中文，有的是直接引用日文，像是「社會」這個詞，就是明治以後所提出的名詞。這些觀念的提出，為晚清到民國製造出一種知識上的文化想像，什麼叫文化想像？就是他們覺得今後文化上的努力，是要建構一個新的中國。

這一點說起來非常簡單，下一點就比較複雜了。新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我們試從晚清的報章雜誌，以